

导 言

在清朝帝国没落、近代国家形成的历史转折时期,出现了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初步接触西方文化,对西方社会逐步形成新的认识,思想观念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于通商口岸是西方人活动最频繁、西方文化对中国冲击最大的地方,这批知识分子首先出现在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等口岸城市,因此成为中国最早的“口岸知识分子”。他们以西方文化为镜,反思中国社会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批判中国社会,为近代中国设计了一幅幅社会改革的宏伟蓝图。本书的研究对象王韬就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口岸知识分子中的一员。通过考察他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变过程中的社会活动以及思想观念的变化,我们可以了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认识世界的历程,总结中国传统士子文人转变为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特征,探究其复杂的心理转变历程,描绘出中国近代国家形成的历史轨迹。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王韬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他特别关注西方诸强国和日本的发展以及它们与中国的关系,并留下了相应的著述,这就使得对他的研究具有比较文化研究的意义。人类不可能脱离生存的环境而独立存在,就文化史的发展来讲更是如此。人的意识实际上是由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所决定的,不可能产生超越特定历史条件的思想和意识,

也没有超越当时的历史环境而存在的人物。在当时看来纯属偶然的一切历史事件,实际上其背后都存在着历史必然性。王韬独特的个人经历实际上是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所促成的,所以必须将其放到当时复杂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

一 中国近代“口岸知识分子”活动的历史语境

在中外文化关系中,在近代之前,中国一直以宗主国自居,将前来中国进行贸易活动或者文化活动的其他国家和民族统统视为被皇威感化的蛮夷,清朝也不例外。在清代,中英关系的发展历程是当时整个中外文化关系的一个缩影。当英国政府最初派遣使者来中国寻求发展两国的外交、贸易关系时,因为无法接受清朝统治者所提出的在他们看来苛刻而屈辱的“跪拜”仪式,这一计划最终宣告破产。1787年英国政府派卡茨喀特(Charles Cathcart)为使节,与清政府直接交涉,希望中国取消对互市的限制,给英商以便利;并希望两国发展互换使节,建立长期、稳定的外交关系。但是,卡茨喀特不幸于途中去世,这次交涉胎死腹中。1792年,英国政府又委派马戛尔尼(George Lord Macartney)为全权使节,与清政府进行交涉。因为乾隆要他跪拜觐见,而马戛尔尼只肯按照英国的礼仪对乾隆行礼,双方产生了龃龉,不欢而散,英国所提出的驻扎使节的要求因为“不合体制”而被毫不客气地拒绝。1816年,英国派遣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Lord Amherst)来中国,希望能获得与中国商人自由贸易的权利。结果,阿美士德因为不肯行跪拜礼而被立即驱逐,命运比马戛尔尼还要悲惨。双方的交涉不可能获得圆满的结果,因为中英两国政府在思想观念上南辕北辙:英国政府要求两国建立近代型的经济贸易关系与外交关系,而清政府则认为凡是来到中国的国家都是大清王朝的臣属国或进贡国,他们必须对大清皇帝惟命是从、毕恭毕敬,绝对不可以和大清帝国平起平坐,否则一切免谈。这是强大的大英帝国无法接受的。当时英国已经发展成为西方世界首屈一指的强国,而大清皇帝和他的臣民们却依旧沉睡在天朝上国的旧梦里,对此一无所知。很多研究者总强调英国在这两次的外交交锋中的失败,而忽略了事件

的两面性,那就是当英国使节要求遭到拒绝悻悻而回的时候,尽管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他们对清政府的政治腐败、武备废弛、闭目塞听已经有了亲身感受和相当全面的了解,这为他们其后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提供了充足的依据。目前历史教科书叙述鸦片战争时,通行的做法很容易把鸦片战争和林则徐禁烟联系在一起,认为因为他领导了禁烟运动因此才导致英国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其实事实非常明显,当清政府所采取的限制海外贸易的政策妨碍了英国的利益,冲突已经无可避免,英国政府所需要的只是一个适当的时机和借口。

鸦片战争前后与西方人士和西方文化有所接触的中国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清政府所任命的直接处理“夷务”的政府官员。他们都是经过严格的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官员,熟读经书,但是对西方国家的情况缺乏最基本的了解。由于清政府明文规定,禁止政府官员跟“夷人”接触,所以他们与西方人基本上没有直接接触。在与西方国家以及西方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极度鄙视西方人,不屑于了解西方国家的情况,经常在形势的判断上出现严重的失误。

林则徐被当作“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备受人们赞赏,就他作为清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首先关注西方、了解西方这一点来讲是无可置疑的,为了了解西方,他确实做出了一些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举动。林则徐(1785—1848),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爱国主义政治家和民族英雄。他所领导的禁烟运动和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办理夷务的过程中,他意识到了了解西方情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想方设法招募懂英语的人才如袁德辉等人翻译《四洲志》等关于西方史地的材料,翻译澳门出版的英文报纸,为国人尤其是清政府当局了解西方国家的情况提供了大量有用的信息。遗憾的是,当时的清政府当局并不关心他所提供的关于西方的材料。但是,在他任职期间,虽然当时他实际上有很多跟西方人交往的机会,但他也总是尽量避免跟西方人有事实上的接触以免招来非议。1839年伯驾托人给患有疝气的林则徐送去疝气带,并留下了这样的记载:“疝气带送去给钦差大臣之后,健康状况良好,只有当他咳嗽时肚子上的东西较易滑落。从他所说的症状看来,他似乎还有气喘,我给他

送去一份药。为了向我道谢,他送来了水果等礼物。”^①伯驾十分重视这次交往,并“专门为林则徐立了一张病历书,编号为 6565”^②。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他请伯驾医生为他治疗疝气时,也是自己佩带了事,虽然伯驾再三强调需要患者本人亲自前来由医生为他佩戴疝气带更为有效。他对西方国家依旧有许多现在看来非常可笑的错误认识,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他甚至曾声称夷兵“浑身裹紧”、“腿脚直扑”,一旦摔倒了爬都爬不起来,杀掉他们简直跟宰牛杀羊一样简单^③,因此对付英夷简直易如反掌,毋庸忧虑。

这种错误认识不仅在林则徐身上存在,在其他办理洋务的官员身上同样存在。直隶总督琦善在奏折中声称,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和大黄,英国人便会大便不通而死:“夷地土地坚刚,风日燥烈,又每天以牛羊肉磨粉为粮,食之不易消化,大便不通立死,每日食后,茶叶大黄便为通肠之圣药。”^④因为西方国家每年需要从中国进口大量的茶叶和大黄,因此,在琦善看来,大清帝国实际上掌握着对夷狄生杀予夺的权力。

我们不能站在今天的立场上责怪林则徐们或者琦善们当时对西方认识的肤浅,对外部世界缺少最基本的认识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但是我们大概不能过于夸大了林则徐的世界眼光。绝大多数办理夷务的官员一直认为(当然大清的皇帝们想法更是如此)幅员辽阔、物产丰富的大清帝国完全可以自给,不需要和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因此一直把准许西方人来华贸易看作大清帝国对他们的施舍和恩惠。在军事上他们则普遍认为夷人不堪一击,不必把他们当作真正的对手看待;但一旦受到西方国家的武力威胁,他们又常常夸大西方国家的军事力量,闻风丧胆,导致在交战时一败涂地。

魏源可能是鸦片战争以后第一位清醒地意识到西方国家对清影响之大的清朝官员。他明确指出,西方国家的入侵使得中国社会

① Chinese Repository vol.VII, pp.624—639。

②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③ 林则徐:《林则徐集·奏稿》(中),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76—679页。

④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五),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22页。

正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他任官的时间不长,1845年秋奉旨担任扬州府东台知县,因第二年母亲陈夫人去世,按照清制须“守制”三年,任县令不到一年的他便不得不去职还乡。1849年阴历六月,魏源守制期满,奉檄权知扬州府兴化县,1851年补授高邮知州。1853年3月,太平军攻陷扬州,清政府拿他问事,不久他以延误军情被革职。除了1841年7、8月间他曾经短期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协助定海防务的筹办工作与“夷人”有所接触外,魏源本人并没有在沿海城市长期生活过。这段短暂的经历让他对西方国家的情况初步有所了解,并根据所抓获的英国俘虏的口供编写了《英吉利小志》一书。魏源与林则徐关系密切,二人早在1814年左右就在北京相识并来往频繁,当林则徐担任江苏巡抚时,魏源在陶澍幕中,同住南京,魏源经常到林则徐处商谈兴利除弊事宜,并帮助他阅卷^①,这为魏源进一步了解世界形势提供了机会。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沿海各省督抚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把责任都推到林则徐头上,指责他过激的禁烟举措导致了战争的爆发。道光帝为了博得英国人的欢心,将林则徐革职部议,其后又将他遣戍新疆,希望以此换取英军退兵的决定,林则徐就这样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1841年农历六月,林则徐在被贬谪途中与好友魏源会面,遂将以前组织人翻译搜集整理的关于西方情况的材料和《四洲志》初稿全部托付给他,请他编写一部较为全面的西方史地著作,以备清王朝了解西方的需要。1842年,魏源的《圣武记》出版。在这部著作中,他记载了清王朝自开国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军事行动,详细描写了清朝的历代武功,希望以此激起清政府和民众的抗英热情,并首次提出了“师夷长技”的口号:“不师外洋之长技,使兵威远见轻岛夷,近见轻属国,不可也。”^②1843年1月,魏源编成了中国第一部介绍世界各国情况的著作《海国图志》五十卷。该书以《四洲志》为主干,在充分利用林则徐在广州时所翻译的西方报刊材料的基础上,又搜集了历代史志和西方人的史地作品编辑而成。“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之《四洲

① 林则徐:《林则徐集·日记》,第131页。

② 魏源:《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61页。

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并近日夷国夷语，钩稽贯串”^①而成。1847年，他又特地前往香港购买了世界地图，补充了《海国图志》的内容，将原书扩充为六十卷。1852年他又补充了西方人士的最新研究成果，将《海国图志》扩充为一百卷。魏源所提出的“以夷制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所谓的“长技”，主要集中在军事方面，指的是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他认为中国应该设立制造厂，聘请法国、美国的技术人才，制造先进的战舰和火器，并且聘请西方军事人才帮助中国训练军队。《海国图志》引进了全新的世界观念，首倡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时代新风，对其后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以及日本明治维新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徐继畲是在晚清出现的另一位首先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他的世界史地著作《瀛寰志略》在当时就被著名地理学家张穆（1808—1849）誉为“海国破荒之作”。徐继畲（1795—1873），字健男，号松龛。1826年，31岁的徐继畲考中进士，1836年担任陕西道御史。1840年7月，当英军进犯厦门时，徐继畲来到与之仅一水之隔的福建漳州担任汀漳龙道，并于1841年2月开始协助闽浙总督颜伯涛在厦门布防。他亲眼目睹了英军的疯狂进攻和清军的惨败，引起了深深的思索，从此他开始留心外事，试图寻找地大物博的清王朝惨败在一个远在天边的“无名小国”手中的答案。1842年9月，他担任福建布政使，并移驻厦门，兼办中外通商事宜。在办理“夷务”的同时，他开始广泛搜集关于世界各国地理、历史、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材料，开始了《瀛寰志略》的写作。从1843年9月到1848年8月，他“五阅寒暑”，“稿凡数十易”，终于完成了书稿。1848年，《瀛寰志略》的第一个版本戊申本在巡抚衙门刊印出版。该书介绍了域外各国的地理和历史，并以赞赏的语气和大量的篇幅着重介绍了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英、法、美等国的经济实力、政治体制和科技教育，研究了中国与西方列强以及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书中收入了42幅地图，相当准确地向国人展示了世界的真实地理

^① 魏源：《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7页。

状况。可以说,他摹画的地图优于当时国内出现的所有世界地图。虽然徐继畲为了不破坏全书的客观真实性很少在书中提出具体的改革建议,但是却以翔实材料,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示了西方国家的历史与现状,透露出当今世界是一个由许多相互竞争的国家构成的多元世界的观点。也正因为如此,该书一出,众议哗然,徐继畲马上成为万夫所指。不久他就因“神光寺英人租屋事件”受到弹劾,既而被免职,解甲归田。从1859年起,《瀛寰志略》在日本风靡一时,一版再版,大大推进了明治维新的步伐,而在国内,该书却由于作者徐继畲被罢官而被打入冷宫。1866年,总理衙门重印了此书,而此时距初刻本出版时间已经过去了18年。

第二类是与西方人打交道的中国商人,在鸦片战争之前主要集中在广州十三行,他们代表清政府与西方人进行贸易,具有半官方的性质,属于国内少数跟西方人有直接接触的人士。大多数十三行商人唯一关心的是如何从西方人那里捞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因此他们反对撤销十三行制度,也反对中国开放其他的通商口岸。然而,他们并非出于爱国之心反对西方人的侵略,而是担心过多开放通商口岸会影响广州的贸易地位和他们的收益。在巨额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他们违反清政府明文禁止西方人留在广州过冬的禁令,让一些西方人冬天也偷偷留在广州,甚至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利益将清政府的防御情况提供给西洋人。他们缺乏最基本的关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概念,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和军事情况也毫不关心,所以,他们当时对国内上层统治阶级和普通民众了解西方国家的情况基本上没有多大帮助。

第三类是在西方人进入中国以后与西方人接触密切的生活在通商口岸的口岸知识分子。他们对西方国家发达的物质文明有切身感受,意识到中国学习西方、奋发自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走上理性批判中国封建社会、倡导资产阶级改革的道路,成为第一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王韬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这支知识分子的队伍在中国由萌芽到逐步发展壮大,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已经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无论采取多么严密的防范措施,清政府都无法再把国人和西方隔绝开来,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会放弃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中国已经整个处在西方文化的全面影响之下。这批

口岸知识分子通过翻译介绍西方科学技术书籍、创办报纸、杂志等方式,推动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中国近代化实际上就是从他们开始起步的。

尽管王韬为西学的传播和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革奋斗终生,作出了突出贡献,但是一直没有得到清政府的重用,一生也没有真正登上过政治改革的舞台。胡适在谈到王韬时曾经深刻指出:“若王韬也是日本统治阶层的一员,他很可能就是一个伊藤,一个大久保,一个大隈,或者至少是一个西乡。但这次,他却是作为一个大古文学家、一个诗人、一个鼓吹中国现代化的社论作家,受到日本爱戴者的欢迎。王韬到死都只是一个写写社论的作家,但他却亲眼看到他的日本同时代人伊藤制定了‘财政改革法令’,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条拟了日本宪法,而王韬却仍在写他的社论!”^①王韬的悲剧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因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不可能给他提供展示个人才能的舞台。在他生活的时代,同样的悲剧事件数见不鲜,黄遵宪、马建忠、严复等人,尽管同怀不世之才,其最终结局都相当黯淡,令人唏嘘不已。王韬所提出的改革思想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列,为当时的传统社会所不容,因此时代不可能真正为他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

王韬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第一代思想家、改革家、教育家、文学家和新闻工作者。他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当绝大多数中国人还囿于传统的思想和生活模式、对外面的世界缺乏必要的认识和理解的时候,他却率先将一只脚跨入了新的世界,倡导西学,倡导改革,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摇旗呐喊。保罗·柯文教授通过将王韬与孙中山先生进行比较进而对王韬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作出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虽然孙中山代表了革命进程的稍晚阶段,在这种意义上他比王韬要新。但若就他们个人一生所包含的文化变化容量而言,从代际变化的相对观点

^① 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60页。

(而非累积或展望的观点)来看,王韬却比孙中山新。”^①王韬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也是在同自己的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接受新事物新文化新思想新观念的过程,他在艰难的蜕变过程中表现出的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正是中国从一个老而衰弱的帝国起步、向近代化逐步推进的历史进程的具体写照。

二 王韬其人

王韬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当他还在世时,就被人称作“长毛状元”,虽然他并未参加过太平天国举办的科举考试。1862年他因为上书太平天国事件遭到清政府通缉而被迫逃亡香港,成为流亡在外的清政府通缉要犯。他又曾经游历欧洲和日本,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走向世界的知识分子之一。虽然他从来没有做过官,但是却和李鸿章、丁日昌、徐有壬等政界要人私人关系密切,深得他们的赏识和器重。

道光八年十月初四日(1828年11月10日),王韬出生在江苏省甫里镇(今角直)。其父王昌桂,字肯堂,是一个旧式的乡村饱学之士,以教授私塾为业。由于他一生没有中过功名,所以对儿子王韬寄予厚望,在设馆授徒时总是他将带在身边,从诸子百家到汉赋唐诗,都细心教授。“少承庭训,自九岁以迄成童,毕读群经,旁涉诸史,一生学业悉基于此。”^②父亲的教诲使他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功底,为他以后从事西书中译和中书西译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13岁起,王韬来到长洲青罗山馆,就学于顾惺。顾惺,字涤庵,尤擅诗词,在当地颇负才名。二人虽是师生关系,却建立了深厚的朋友般的友谊。顾惺的性格具有双重性,他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认为文人应该“积硕学为世用”;一方面洒脱不羁,时常召集

^① [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雷颐、罗检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8页。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一,“弢园老民自传”,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长洲王氏上海重排铅印本。

学生饮酒唱和,不为师道和习俗所左右。王韬非常崇拜顾惺,后来二人成为莫逆之交,其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都对王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他后来表现出的强烈的治国安邦的经世思想和喜欢酒色征逐的名士作风上都可以看到顾惺的影子。1844年王韬赴昆山县参加童子试,崭露头角。主考官对他的文章击节赞叹,认为他虽然位在幼童之列,但“文颇不凡”^①。第二年,17岁的王韬再次去昆山应试。主考官张芾称赞他“文有奇气”,文章被圈为第一等,“拔冠邑庠”^②,考中秀才。王韬踌躇满志,觉得灿烂的仕途已经开始在他面前展开,然而,在1846年的南京乡试中他却马失前蹄,名落孙山。对王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也使恃才傲物的王韬对科举制度产生了不满,他认为自己这么优秀的人才都无法从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这说明考试制度本身存在严重的问题。

1840年6月,父亲的去世意味着王韬悠闲舒适的书斋生活的终结。为了谋生,他进入上海墨海书馆工作,开始了长达13年的佣书生涯。在这期间,他日与“夷人”为伍,从事协助传教士把西文书籍翻译成中文的工作。通过与西方人的交往,他对西方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而西方科学技术书籍的翻译工作则让他获得了大量西学知识,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意识到中国在很多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开始反思中国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开始了从传统文人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艰难蜕变。如果没有1861年的上书太平天国事件,王韬的译书生涯可能会继续下去,或者像他的墨海朋友们一样进入某个洋务派官僚的幕府,为中国的近代化改革出谋划策。由于从1860年8月19日起太平军围攻上海形势颇为紧张,王韬于1861年冬护送家人返回故乡甫里。同治元年三月六日(1862年4月4日),清军攻破刘肇钧大营,缴获了1862年2月2日苏福省儒士黄畹给刘肇钧的上书。经过调查,清政府认定上书为王韬所写,于是下令通缉他。王韬走投无路,

^① 王韬:《漫游随录》卷一,“登山远眺”。见《漫游随录·扶桑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

^② 王韬:《瓮牖余谈》卷一,“张小浦中丞师殉难”,上海大连图书供应社,民国二十四年(1935)5月。

在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和麦华陀(W. H. Medhurst)的帮助下躲进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内避难。清政府派遣了很多兵士在英国领事馆附近对他进行监视,王韬被迫“闭置一室,经一百三十五日”^①,甚至无法前去为其间受惊吓而死的老母亲尽孝送终,留下了终生的遗憾。由于风声吃紧,王韬被迫于同治元年闰八月一日(1862年10月4日)逃亡到香港,他在上海的西书中译工作就此划上了句号。

流亡香港在当时对王韬来说无疑是极其痛苦、极其无奈的一个选择。但是他后来的经历表明流亡香港在客观上拓展了他的视野,促进了他对西方的了解,直接促成了他从传统文人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变。他开始在英华书院协助理雅各(James Legge)将中国古代典籍翻译成英文,在向西方输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867年,当理雅各因事回国时,盛情邀请王韬前往欧洲继续中国经典的翻译工作,王韬有幸成为近代最早走出国门看世界的中国文人之一。通过这次历时三年之久的欧洲之行,王韬真切感受、了解了欧洲文化,对中国社会的问题和症结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回到香港后,1874年,王韬出任《循环日报》主笔,在报纸上发表大量的政论文,倡导资产阶级改革,成为近代资产阶级改革的倡导者。1879年,王韬又游历了日本,看到了学习西方获得成功的一个范例,更清楚中国此后的走向,回到香港后在报纸上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为中国改革出谋划策、呐喊助威。

在友人丁日昌、马建忠、盛宣怀等的斡旋下,1884年,王韬这个被清政府通缉长达13年的清廷要犯得到李鸿章的默许,终于回到了上海。他自号淞北逸民,决心远离世事,“仰屋觅句,闭户著书,不欲问世上事”^②,以便能在上海安安稳稳地度过自己生命中最后的岁月。然而,当1885年他被聘请担任上海格致书院山长^③时,他立即忘记了自己不问时事的决心,精神抖擞地以全副精力投入教育改革的实践

① 王韬:《王韬日记》,方行、汤志钧整理,中华书局,1987年7月第1版,第195页。

② 王韬:《弢园尺牘续钞》卷五,“呈邵筱邨观察”,清光绪十五年(1889)上海弢园书局淞隐庐刊本。

③ 所谓“山长”,即现在所说的院长。

中去,直至 1897 年去世。

王韬的一生,是在近代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的对抗和逐步融合中努力摆脱旧思想、旧观念,接受新思想的一生,是竭尽个人的力量推进中国近代化改革的一生。他以自己毕生的努力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作为一个毕其一生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促进中国近代化改革的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代表人物,王韬在晚清社会的出现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成为近代中国学习西方、走向世界的具体而微的写照。窥一斑而知全豹,通过对王韬的研究,我们可以勾勒出晚清时期西方政治思想、文化、科技在中国的传播轨迹,展现中国社会逐步走向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三 王韬研究的学术史概况

王韬活跃在 19 世纪后半叶中国的社会舞台上,他的论著基本是在这一时期撰写的,其中大部分公开出版了(参见附录一“王韬著述及版本情况”)。对王韬的研究,可以说起步很早,在 20 世纪初期就已经有人开始关注他。50 年代以前发表的关于王韬的论文约有 20 余篇,这些论文大都偏重于对其日记等手稿的整理和生平事迹的介绍、考证,间或有文章评论其诗歌创作,大多浮光掠影,没有涉及王韬的思想及行为的社会意义。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至 80 年代末,中国学术界对王韬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入。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对其政论文、变法思想和游记的研究三个方面。1956 年,方汉奇的《王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报刊政论家》发表,论述了王韬的报业生涯和政论文创作,对王韬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进行了定位。对其政论文的研究成为王韬研究的一个热点。其后出现了谢无量的《王韬——清末变法论之首创者及中国报道文学之先驱者》、忻平的《循环日报》、牛仰山的《报章体文的开拓者——王韬》等一系列论文,但是,由于国内没有《循环日报》保留下来,当时研究者一致认为《循环日报》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对王韬政论文的研究都局限于《弢园文录外编》这本政论文集,所以有关论述未免失之偏颇,略嫌美中不足。除了上面提到的谢无量的论文,吴

雁南的《试论王韬的改良主义思想》、马东玉等的《王韬的“变法自强”思想》也对王韬的改革思想进行了论述。同时,人们开始注意他的游记体散文《漫游随录》和《扶桑游记》,出现了《王韬的〈扶桑游记〉》、《王韬和〈扶桑游记〉》等论文。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二卷)中郭延礼对《漫游随录》和《扶桑游记》归为一类进行了综合研究,探讨了二者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在众多的研究中颇具新意。

进入90年代,王韬研究进入全面综合研究的新阶段。这期间出版了四部关于王韬的著作,两部《王韬评传》、一部《王韬年谱》和一部王韬研究专论《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这充分表明王韬在中国近代文化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已经逐步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王韬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1990年4月,忻平先生的专著《王韬评传》发表,这是一部对王韬进行全面研究的开山之作。该书考察了王韬的生平,认为他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奠定了其后学术界王韬研究的基调。1993年11月出版的张海明的《王韬评传》是一部王韬研究的力作。该书全面而详细地介绍了王韬不同寻常的生活经历,并分别从政治、经济、外交、文艺、教育等五个方面研究介绍了他的改革思想,是王韬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上述两书既然以“评传”名,当然更侧重于对王韬生平事迹的考订和叙述;对于王韬从事中外文化交流中活动的价值以及倡导资产阶级改革等一系列行为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就有所忽略。可能因为有些原始材料作者当时没有看到,导致论述中存在某些历史事件的叙述上的错误。

1994年11月,张志春编著的《王韬年谱》出版,将王韬生平的研究推向深入。书中将王韬有生之年所发生的世界大事都在相应的年月一一列出,这样对于研究者了解他生活的时代和他的行为的社会意义具有借鉴意义。该书还考证了王韬历史上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他本人力图掩饰的一些情节,比如王韬和太平天国的关系、王韬上书太平天国的真相、王韬“长毛状元”称号的由来等等,对于解决这些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大有帮助。但是,不足之处也相当明显。张志春编写《王韬年谱》所参考的材料,除了一些中外历史书籍,主要是王韬本人的著作,对于各个历史时期与王韬一起工作的中

外人士所留下的相应记载没有加以利用。这样就造成该书存在两个缺憾：一方面，即使是王韬生活中相当重要的事件，如果他本人没有留下记载，作者就只能付之阙如；另一方面，王韬有时会对过去的某些情况进行文饰或者出现记忆错误，由于作者过分相信王韬本人的叙述而不进行进一步的考证，这就导致在年谱中这些错误信息同样出现。但总体来说，这是一本史料翔实的著作，对于后来者的王韬研究提供了很大帮助。

美国著名学者柯文(Paul A. Cohen)的《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英文本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发表于1987年，但是在当时国内学者没有注意到这本著作，对于国内的王韬研究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直到1998年中译本出现，才广为国内学人关注，所以，本书把它作为90年代出版的译著进行介绍。该书实际上也有传记的特征，但是它注重从大的历史背景下考察王韬的行为所具有的革新意义，开阔了读者的眼界，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同时，因为柯文是一位美国学者，所以他不仅利用了一些国内看不到的英文材料，而且自始至终从西方文化的视角看待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变革，注意到了西方文化对王韬的影响、对中国社会的冲击以及中国社会作出的相应反应，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思路。但是，正因为柯文是一个西方学者，占有的中文原始材料相对比较少，这就使得某些论述流于空泛。

90年代以来，王韬研究的论文也大量出现。对王韬的研究开始突破了前期研究王韬生平和笼统整理介绍王韬著作的局限，进入相当全面的研究阶段，考察王韬的改革思想的，如张广杰的《王韬商本思想论略》(《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8/01)，唐富满的《试论王韬的吏治改革思想》(《理论界》，2007/11)，盛振兴、陈九如的《以考课为例看王韬的人才观》(《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12)等；考察王韬的新闻思想的，如庄廷江《王韬与〈循环日报〉》(《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06)，谢丹的《〈循环日报〉与王韬的民权思想》(《当代传播》，2008/02)等；考察王韬的教育思想的，如李琴的《王韬教育思想述评》(《吉林教育》，2008/10)，黄潇凯的《王韬教育思想的反传统性探析》(《安康学院学报》，2007/01)，田庆轩、郑毅、高巨华的《试论王韬中西交错的教育思

想》(《教育与职业》,2006/23)等。但是,总的说来,对王韬作为中国首批近代口岸知识分子的文化特征的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尚未全面深入地展开。

本书力图从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的视角,采用原典实证的研究方法,把王韬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系统全面地考察他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活动以及西方文化的冲击给他带来的思想观念上的变化,研究他对19世纪后半叶晚清社会改革所起的推动作用。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尽量做到以材料说话,不发空论。由于本书关注的重点是王韬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所以不对他的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进行专门的论述。

第一章

上海墨海书馆： 西学的初步接受与传播

上海是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见证。自 1842 年上海被开辟为通商口岸以来，西方资本大量涌入上海，英国、美国、法国等先后在上海开辟租界，划分势力范围，到 19 世纪 60 年代，上海已经形成了公共租界、法租界与中国人居住区并存的局面。西方殖民者在上海租界这个特殊领地内，想方设法通过建造教堂、创办学堂、设立医院等方式推行本国的文化形态，上海开始出现新的城市生活方式、新的休闲方式，并日益为人们所接受，上海从此逐渐演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商业城市。外滩上迅速崛起的风格各异的西式建筑群，为上海博得了“世界建筑博览会”的称号，同时也成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有力证据。殖民者在对 中国进行经济、文化渗透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对上海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代上海特殊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为近代中国的发展造就了一批特殊的人才。西方大量政治、经济、文化机构在上海的出现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待遇颇为优厚的工作机会，吸引了一批落第文人先后进入这些机构工作。由于在科举考试中落第，在传统的社

会机制中这些文人通往社会上层的道路被堵塞了；为了谋生，他们先后进入这些西方机构工作。在与西方人的合作中，他们从对西方文化一无所知，到对西方文化形成初步的感性认识，最后到切身感受到近代西方文化的科学性和进步性（当然，他们也逐渐认识到近代西方文化的局限性），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转变。这些深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正统思想影响的传统文人，由于切身体会到中国要自强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乃至思想观念的必要性，因此成为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一批知识分子，成为倡导学习西方近代先进科学文化的先行者，我们称之为中国近代“口岸知识分子”。

王韬在《漫游随录》中谈到自己在上海的生活时说：“余自己西九月来上海，迄壬戌八月，凡十有四年。”^①也就是说，自从1849年到上海工作，直到1862年离开上海逃亡到香港，其间除了曾短期回故乡江苏甫里探亲和参加科举考试之外，王韬在上海前期^②在墨海书馆连续工作了大约13年^③的时间。王韬初次到上海时，上海已经开放达七年之久，黄浦江上航行着大量的西洋船舶，黄浦江边则矗立着气势宏伟的西式建筑。发达的西方物质文明强烈吸引着王韬，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强烈冲击。在与传教士合作翻译西学书籍的13年中，他与西方传教士朝夕相处，置身于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的旋涡之中，亲身感受到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巨大冲击，见证了上海从一个普通的县城发展成一个国际性的殖民大都市的历史进程。受西方文化影响，王韬开始以相对比较客观的眼光来看待西方文化与西方文明，并且以西方文化为镜反过来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逐步改变了传统的儒家观念，开始了从传统文人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变的艰难蜕变过程，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批口岸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① 王韬：《漫游随录》卷一，“黄浦帆樯”，岳麓书社，1985年3月版，第60页。

② 王韬1884年从香港返回上海后，一直居住在上海，直到1897年去世，这是本书第五部分将要探讨的内容。为了论述的方便，本书把王韬在上海墨海书馆工作的时期界定为王韬在上海的前期，而把王韬1884—1897年居住在上海的时期界定为王韬在上海的后期。

③ 王韬自称在上海居住了十四年，他的计算方法类似于传统上中国人计算年龄时所采取的虚岁计数法，实际上他前期在上海居住了13年。